

第五章 接受改造

怀着悔
愧心情
上北京

自从在汉口上车以后，方靖的思想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回顾一下这几年来自己的经历：从大洪山到武昌看守所，换了五、六个关押单位，尽管在生活待遇上时好时坏，接触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各有不同，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始终如一。然而他在这几年中，对共产党却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更不相信共产党对他们这些战犯抱有改造他们成为新人的良好愿望。由于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对“思想改造”这几个字听都不愿意听。为什么在被俘后他总是准备死呢？为什么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怀疑共产党要处决他呢？尽管他现在还认识不到他在为蒋介石效命期间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对共产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他疑惧的真实理由。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并没有根据他的罪行处以极刑，而是要挽救他。他毕竟良心未昧，在众多事实面前，他是怀着愧悔心情到北京的。

两辆小轿车在月台上接了方靖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

号。北京居民都知道，这里过去叫模范监狱，当时叫第二监狱。

方靖走进这个新的环境，使他感到新奇的事是：第一，从上到下，从外到里，一齐脱光，全部换新；第二，便是分了个“五号”的代号。这使他意识到：这里一切井井有条！

管理员对方靖说：“把你脱下来的东西包起来，还是你的。我们这里有严格的制度，这里可能有你认识的人，见了面不要交谈，他们问你什么，你也不要回答。听明白了吗？”

方靖并没有听明白，但是他点了点头。

进入功德林监狱

走进八角亭，他顿时晕头转向了：八条胡同一个样，根本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他跟随管理员走进一条胡同，来到了一间房门前。管理员开了锁，他当先进去。

屋里一张炕，旁边还有一张单人床，里面坐着四个人，一见方靖进去，都兴奋地站起来，象是要拥抱的样子。但当方靖看清了他们，也准备热烈相见时，那几个人突然退回去坐下了，并把头一低，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方靖很纳闷，摊着手问：“喂！喂！你们怎么不说话呢？怎么不说话呢？”偶一回头，见管理员已跟进来了，却还不明白。

管理员指定了方靖的床位在炕上，说了句“你收拾一下”，便走了。

方靖并不急于整理行李，却坐下来仔细观察同屋的四个人：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六十六军中将军长宋瑞珂；第三军中将军长罗历戎；第十军中将军长覃道善。黄维在十一师时曾是方靖的上级，宋瑞珂是方靖的下级，覃道善也是十八军十四师

培养出来的军官。这三个与方靖同是陈诚军事集团中的干将。罗历戎虽然是胡宗南的部下，在江西“五次围剿”以后，平定广西事变时与方靖共同作过战。一句话：这四个人与方靖过去的关系很不一般，现在见了面，一个个垂首无言，难怪方靖奇怪，最后他甚至生气了：“他妈的，这几个家伙怎么六亲不认了！”“哼”了一声，赌气转身去收拾行李。

过了半晌，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蹒跚走到七十九军军长身边，用肩膀推了推对方：“喂，你老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方靖还在气头上，翻翻白眼：“捣什么鬼呀？要问就大大方方嘛！”第三军军长以右手食指压住嘴唇：“嘘——？”又朝方靖摆摆手。

方靖虽然仍旧莫明其妙，看看那几个人的样子，只好顺从地凑过去。几颗头颅挤在一起，嘀嘀咕咕地交谈起来。

晚上，管理员把“五号”叫去，严肃地问：“叫你不要跟他们交谈，你为什么要交谈？”方靖愣头愣脑地回答：“为什么不准交谈？我们过去是同事，也是好朋友，见了面谈谈心，人之常情嘛！”管理员点点头：“你们过去的关系我们很清楚，正因为这一原因，才把你们放在一起，便于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但是，不准交谈是这里的制度啊！你是军人，应该懂得纪律吧？”

过去在刘家花园，关门以后，管理人员也曾要求他们不要互相交谈。卫兵发现他们交谈，就把其中之一叫出去：“站好了，老实坦白交代——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方靖还记得第一个被叫出去的是张淦。“小诸葛”装得毕恭毕敬的样子回答：“报告！我们谈的是唐僧取经！”一顿训斥之后，张淦回屋笑得前仰后合。如此这般，后来卫兵也不管了。现在功德林的管理员对方靖并

没有拿腔作势，平静的语调中却有不可抗拒的威严。简短的几句话使方靖明白：一切了如指掌，不必故弄玄虚。管理员的话点明了：并不怕你们交谈，而是制度规定不许交谈。方靖承认：既然是制度，就必须遵守！他第一次向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承认了错误：“既然我违反了制度，那就处分我吧。”管理员摇摇头：“处分不必，在生活会上检讨检讨吧。”

“生活会”是个什么形式？“检讨”又该怎么做？这个自由散漫了六年的战犯，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词。回到房里，躺在炕上，便向他过去的老上级请教：“管理员要我在生活会上做检讨，这检讨该怎么做啊？”黄维听了，冷笑说：“叫你去，我就猜到了——是覃道善打的小报告！”方靖一惊：“怎么会是他打的小报告呢？”“你以后慢慢就会明白的。检讨嘛，你就说犯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有害于个人，也有害于集体。”

方靖躺在炕上睡不着了：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有害于个人，也有害于集体……有这样严重吗？怎么会是覃道善打的小报告呢？覃道善不是十八军的“自己人”吗？他对这陌生的环境很想研究一番，但又一时摸不透。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早上放风的时候，方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他当年在荆门的顶头上司——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他看到的第二个人是他在九十八师当旅长时手下的一个营长（被俘时是青年军二〇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他的感情又有点冲动了，但他的“自由主义”企图，却被对方慌慌张张地避开所阻止。

一盆冷水自然还不够，第二盆正等着方靖。

方靖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件衣服晾在院子里的绳子上，放风时间一到，他去收衣服，正巧旁边晾的一件衣服，是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的。杨伯涛显然早已发现了他，所以过来取衣服时，侧着身，故意不看方靖，以极迅速的动作，收了衣服转身就走。这一下，方靖懵了：“我这个自由主义竟是这样可怕吗?!”

方靖感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正规化了。不仅是生活井井有条，而且管理员既关心战犯的思想改造，也关心战犯的生活与身体。这对方靖来讲，并没有什么约束感，因为他当了三十多年军人，又是个比较刻板的人，所以尽管过去放任了六年，现在也能够习惯。由于在来京的途中思想上起了微妙变化，学习也能够接受了。原本是可以极平稳地过渡到新环境的，但是，有一天晚上失眠，胡思乱想，老毛病又犯了：“啊呀，陈诚军事集团的人都集中在北京了，这是不是要首先审判我们的信号啊?!”这是方靖最后一次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怀疑。“唔，过了年(春节)再看吧。”他按照旧社会的习惯：“年关年关”，过年是一关嘛。心想：欠账都是在年关结算的，他欠共产党一笔血债，也可能在年关结算清楚。

宽大的政策，英明的措施

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初，一批又一批的战犯集中到功德林来了，其中有：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徐远举。可以说，国民党军

中的“精华”大半集中在这里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公安部的姚局长来到功德林，向在押战犯宣布了共产党的又一宽大政策：即日起，不关门，战犯之间可以来往交谈；允许通家信，可以接见家属。最大的意外是：将要组织战犯去全国各地参观！

这一宽大政策，震撼了所有战犯，就象在这些战犯头脑中的顽固堡垒上，掀开了一个再也无法堵塞的缺口！

对于姚局长，战犯们是满怀崇敬的，他们甚至把姚局长当成了牧师！因为总是由姚局长给他们送来福音——共产党的一个又一个的宽大政策。所有战犯们都盼望姚局长多去，多听姚局长的报告。他们把姚局长看成了共产党政策的化身。

方靖来到功德林的时候，还只不过三十多名战犯。随后，各地关押的战犯，都解到北京功德林来集中改造。

古今中外对待战俘无非用两种手段：一种是处以极刑，这多半顾虑贻患于未来；另一种便是利用。方靖等人总以为与共产党真刀真枪打了几十年，既然被俘虏，决无获生之理。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战俘却采取了真诚相待的改造政策，竟组织他们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

战俘出去参观访问，自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希望他们这些人通过参观访问，了解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果；通过新旧对比，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幸福、为祖国求富强的；同时也使他们醒悟：几十年跟着蒋介石干，对人民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

参观访问的目的，战犯们是清楚的。方靖在参观访问后，

发言谈体会时说：“与其说通过参观访问后使我们愧悔交加，毋宁说参观访问这一措施本身是推促我们要下定决心重新做人。我们从这一措施中深深体会到：共产党是在真心实意地想方设法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而不是我们原先想的那样，要从肉体上把我们消灭。

“蒋介石常常宣扬‘精诚所至，顽石点头’，但是，他从来没有使他的任何一个对手真正屈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精诚’不是光明正大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与人为善的。共产党对我们这些战犯，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从来没有搞过压服。当然，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人戴过长时期的脚镣手铐，但那是为了打掉他们的傲气。

“无论我们思想多么顽固，我们毕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政策，挽救我们的措施摆得明明白白，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在姚局长宣布又一宽大政策之后，战犯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有了求生的欲望，也就有了改造思想的动力。

方靖在北京改造的十一年中，参观访问的地方除北京的建设和工厂外，一九五七年去过长春、辽宁、天津、武汉，一九六五年经南京、上海、杭州到新安江水电站等地。每一次参观访问，对他们的教育都是极大的。此外，让他们与家属通信和接见家属，对改造也起了积极作用。

自从人民政府准许他们通家信后，大家纷纷向外写信，自然盼望能够得到回音。但是，经过六、七年的变迁，有许多人的家属已经不在原来住处，一时难以知道下落；有的人的家属

在解放前夕已离开大陆，暂时无法通信，这些人自然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在于有些家属的来信内容。如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得到的回信是儿子写的。他离家之时，儿子尚未成年，现在，儿子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了，自然是爱憎分明。他给父亲的回信既不写称呼，下面也不落个名字。信的内容只是劝他要听共产党的话，认真改造思想，争取重新做人，“也只有在你获得党和人民的谅解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见面”。言外之意便是：如果不好好改造，便不认这个父亲。

一九五六年六月，方靖的儿子带着第二个孙女到功德林看望他。那时二孙女才两岁，天真活泼，十分可爱，她欢呼着“爷爷”，扑在方靖怀里，要他抱，亲吻他。当时他是既高兴又难过。他高兴的是看到了隔代人，如果祖孙三代欢聚一堂，他的晚年必定会很幸福；他难过的是孙女和后来的孙儿都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他们懂事以后，知道爷爷是个战犯，还能这样亲热吗？所以当一九五七年五月方靖的儿子要求他给新出生的孙儿取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取了个“新生”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已经下了决心，要努力改造思想，争取共产党和人民的谅解、宽大，从而获得新的生命。

民主人士去看望战犯，对战犯们的教育也是很大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从香港回归大陆的卫立煌去功德林看望方靖。他和卫立煌的关系是在粤军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是卫在粤军任团长，方靖在卫的手下当连长。

卫立煌在蒋介石集团中的地位，与陈诚是平级的。他的为人却比陈诚宽厚，也不拉帮结派。因此，杂牌军都愿意接近他，

不愿意接近陈诚。

卫立煌去功德林看望方靖的前一天，管理员已通知了他。这个消息使他兴奋，与老长官阔别多年，能够再见面，自然是件喜事。此外，他也想从卫先生那里，得知一些蒋介石、陈诚的情况。

功德林规定接见的日期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和第三个星期二。家属在规定的日期来功德林看望战犯，先在门道两旁的传达室内登记，并将带去准备给战犯留下的衣物、食品交给管理员，验收以后给家属一张收条。当家属被带到指定的会客室后，管理员再进去把战犯带出来，家属与战犯交谈的时候，管理员坐在一旁听着，但并不插话，也不催促。

卫立煌
探监

卫立煌以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身份去探望方靖，自然与一般家属探视不同。方靖被带进一间宽敞的客厅，里面铺有地毯，摆设着沙发，管理员很有礼貌地退出客厅，并轻轻掩上门。

方靖十分激动，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卫立煌十分关心地问到方靖在改造单位的学习、生活及身体情况。方靖则问起卫在香港的情况。卫立煌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唉！那个地方哪是我们这样的人能住的呢？当然，有一些人当初卷走在任时的钱财，到香港去做生意，仍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他们内心是空虚的，怀念祖国，怀念在大陆的亲人，精神十分痛苦。也有两袖清风的，在那种人吃人的社会，只有饿毙街头。国民党的特务也在那里捣乱，哪里允许我们这样的人过安稳日子呢！”

方靖虽然没有到过香港，但是，从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香港被军统特务刺杀一事，也可以想见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活动之猖獗。卫立煌坚决不去台湾，蒋介石哪里会让他在香港过安稳日子呢？

方靖又问，在香港是否可以听到台湾国民党和蒋介石、陈诚的情况？卫立煌摇头说：“这还用问吗？在那样一个孤岛上，拥兵几十万，一切都要依赖美国人。他们的日子能好过吗？我们都跟了蒋先生几十年，对他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很清楚的。想当初他派我去东北接陈诚的‘剿总’职务，如果说辞修当初去东北是临危受命，那我更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都是为蒋先生效命吗？谁知东北一败，他竟派宪兵把我软禁在上海！若不是有一些元老再三讲情，我恐怕也做了张学良第二了。如此多疑，又何能共事呢？所以我宁可去香港过清淡生活。”他还为自己归国太晚而后悔。他说：“如果一解放，我就下决心回来，也可以多作一些贡献。当然，迟是迟了一点，总比至今还不肯回来的好。”

卫立煌也与方靖谈到晚节的问题。他说：“所谓气节，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忠诚。我们是了解蒋先生的，如果把个人的晚节寄托于蒋先生，显然是不可取的。在北伐时期，我们与共产党合作，部队的政治工作都是由共产党来做。那时部队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是欢迎的。你再回忆一下：自从与共产党破裂以后，部队的情况又如何呢？

“现在共产党既往不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敌对情绪呢？所以，你千万不能再执迷啊！”

老长官一席话，可谓语重心长，对方靖的启发很大。

蒋介石的暴虐，方靖虽然也知道，但是他总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学生，“一日为师，终生是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他能褒贬蒋校长吗？经过卫立煌一番开导，他把自己追随蒋介石三十余年的经过仔细回忆了一遍。北伐到南京以后，至参加上海抗战以前，他在军队中几乎天天打仗。且不谈跟共产党打仗，就拿打军阀来讲，也是你死我活地拚命，不少将士流血牺牲，场面也十分壮烈。但是，打过以后不久，被打的军阀头子，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并且对“革命军”发号施令。他在当时接到被打过的军阀头子签署的命令时，不禁搔着头皮骂一句：“真他妈的活见鬼！”他也曾对“国民党不抗日”这一说法十分反感，因为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亲自率部与日寇在上海、河南、湖北、长沙、桂林、四川边境等地，作过多次殊死战。后来，他听到沈醉等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及汉奸汪精卫等人勾结的事实，他懊恼极了！

他不能不承认卫立煌说得对，为蒋介石保持晚节，真是一件蠢事！

曲折漫长的改造道路

但是，思想改造也并不能靠外因的帮助就能顺利过关。尽管方靖已经有了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决心，改造思想的道路，却还是曲折漫长的。

首先，旧的观念还妨碍方靖的进步；其次是旧的关系也阻碍他的前进；第三，旧的恩怨使之不能辨别新的是非；第四，摆在表面的一些事他能够承认，思想深处的东西却不愿痛痛快

快暴露出来。

当然，这些问题不仅方靖个人有，实际上在战犯改造时期，有其一定的普遍性。

还是在武昌看守所的时候，有一次，看守所长递给他一本书。他接过去一看，封面上有七个大字：“人民公敌蒋介石”，便往地上一扔，板着脸说：“这种谩骂性质的书，我决不看！”到了功德林以后，通过各种思想教育，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听到别人指责蒋介石，他也能说说自己的看法了。但是，对于他的老上级陈诚，绝口不提。倘若有人骂陈诚，尽管他沉默不言，却对此人怀恨在心。这并非是说他认为陈诚其人完美无缺，陈诚吞并杂牌部队手段之残酷，揽权手段之厉害，他都清楚。但是，在他思想感情上却存在理所当然的偏袒。此外，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形成嫡系将领瞧不起杂牌将领的习惯，所以尽管同在改造之中，他仍然瞧不起杂牌军的将领。杂牌将领或是他原来的下级提的意见，无论对与不对，他都不能接受，或是公开反驳，或是冷笑不听。然而他过去的上级或是同级的嫡系将领提的意见甚至批评，无论对与不对，他都能心平气和地听完，并且接受他认为有理的部分。

就拿他对黄维和宋瑞珂来讲，就是很好的例子。

杜聿明在被俘初期由于对抗情绪作祟，动辄拍桌骂娘。黄维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对抗。他的个性原本孤高自傲，来到功德林以后，更表现得冷酷无情。他不理睬别人，也不愿被别人了解。当然，任何人的劝告他也听不进去。别人劝他：“你看共产党对你我多好啊，不仅生活上安排得妥当，而且

对病号有特殊照顾，患有慢性病的人，还给订牛奶。为了治疗你和杜聿明的病，特地派人到港澳买药……”他不等对方说完，就冷笑说：“对我愈好愈残忍！”事后他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话太不近情理，一次生活会追问他时，他又矢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他以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对待思想改造，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埋头搞自己的一套。方靖看到他的时候，留着长长的胡须，意思是“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监狱里剃掉”！他曾拒绝过治病，也拒绝过管理员的照顾，这就是他说的“不接受共产党的恩惠”。也许基于这种思想，他也不愿意接受改恶从善、宽大特赦的思想。为了表示他拒绝改造，经过冥思苦想以后，便提出要发明一种“永动机”，并已命名为“黄维永动机”。他私下对宋瑞珂说：“等我设计好了，一定会放我出去搞试验；我试验成功了，就想办法把你也弄出去！”宋瑞珂不知底细，所以开始全力支持。

方靖得知黄维要搞发明，不禁暗暗吃惊。他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便向黄维请教这“永动机”的原理。黄维告诉他：主要原理是“由重取得动”，并且“不停止地往复运动”。方靖开始琢磨这个原理：重，可以用物体下垂来解释，动，可以用有一作用必有一反作用来解释。他设想抛起一个皮球，皮球从空中下降，是一重力；落到地面上弹跳起来，成为一动力。这都毫无问题。但是，如果要把这种“重”与“动”冠以“永”字，他就不能信服了。他把这个简单设想讲出来，试图与黄维讨论，却不料黄维哼了一声：“你懂什么？不要胡说八道了！”

由于黄维只迷信自己的“永动机”而抗拒思想改造，引起

了大家的注意。在小组生活会上，大家帮助他提高认识。方靖一开始便表示：“我来得晚些，还不大了解黄维过去的改造情况和‘永动机’之事的经过，所以想先听听大家的发言。”说完，便沉默不语了。小组会上发言最积极的是覃道善，这使方靖大为惊讶：“唉呀，都是十八军出来的，相煎何太急！”宋瑞珂次之。罗历戎本不擅于说话，闷声不响，被覃道善指责为与黄维“订有攻守同盟”。

小组会没有说服黄维，便拿到大组会上去帮助。旁人的话多么激烈倒也罢了，唯独杨伯涛的发言，使方靖大为反感：“怎么搞的？你这个十八军军长，还是黄维委任的呢？怎么可以这样恩将仇报！”他觉得杨伯涛已经浑得不可理喻了，于是私下对宋瑞珂说：“都是老同事，彼此照顾一些吧。让别的人去骂就够了，我们何必再火上浇油呢？”宋瑞珂急得直哭：“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治病救人嘛！大家这样帮助他，他的立场还不转变，这才是我们应该多用些心的事哩。”这一点，方靖一时还不能理解。

方靖之所以不能理解，就在于怀疑有的人的激烈发言，不是与人为善，而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或是“伪装进步”。王耀武来到功德林，表现积极。他和宋瑞珂都是山东人，平日比较接近，方靖就怀疑宋瑞珂的进步（尤其是对黄维的帮助），是跟王耀武“学坏了”。而王耀武为什么会这样“坏”，他也有“根据”：王耀武是黄埔三期毕业的，论其资历，尚不应该爬到山东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的高位（宋瑞珂也是黄埔三期毕业的）。皆因为人比较圆滑，擅于交际，甚得上司欢心。凡是中央派到他部队来点验的，他都殷勤招待，上自点验官，下至卫士、马夫，

都给他们的私囊塞得饱饱的。这些人回到中央，没有一个不说王耀武的好话。因此，方靖便公开说：“王耀武的进步是假的！”事后管理员找方靖个别谈话，并没有声色俱厉地批评，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你说王耀武的进步是假的，那么，王耀武在被俘之初发表公开信也是假的？你在被俘之初不肯发表公开信也是假的？”方靖被问得哑口无言，不能不承认：进步需要有思想基础。

方靖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也代表了一小部分人。这些人自己不进步，却怀疑别人的进步。有人说：“那你也伪装一下让我看看！”他干瞪眼“伪装”不来。当然，这些国民党的将军们都来自旧社会反动阶级的上层，那些原有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坏习气，在改造中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因此，在改造过程中，还有一场干扰和反干扰的斗争。

有一个重要问题，在改造中需要认真解决，那就是：这些战犯在蒋介石集团中的地位问题。更确切些说，就是对自己在蒋介石集团中的资历、官爵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资历深，官爵高，在国内外会有一些的政治影响，并对蒋介石统治期间的几十年历史了解得多一些，深一些，如果接受改造，靠拢共产党和人民，可以为祖国的统一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这资历、官爵的深浅大小，也与他们所犯的罪行大小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当然，这些人通过改造，在共产党教育下，绝大多数人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但是，也还有个别人却并不以过去的历史为耻、反引以为荣！譬如，徐远举其人的资历及其在军统中的

地位，远不如文强、沈醉等人。但是，自从小说《红岩》出版以后，徐鹏飞这个反面人物为广大读者所知，后来又拍成电影，影响就更大了。一九五九年第一批特赦，徐远举名落孙山，他就大叫大嚷：“我哪一点不如他们？”后来他自己找“差距”，竟然有了“妙悟”：“我的改造是及格的，只不过因为民愤太大，所以不能早特赦。”这“及格”的分数是自己打的，那么，他又是如何给自己打分的呢？他说：“我也写了交代材料，我也揭发了许多问题。”原来他将交代罪行和写揭发材料，当成了主要得分因素，并不认为这是战犯接受改造的本份。

在发给战犯的特赦通知书里，有这样一段十分尖锐的话：“在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了确实的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因此，打分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改恶从善”方面，交代罪行和揭发问题，只能看做认罪和从善的决心。徐远举不能端正思想改造的态度，难免要暴露其无决心认罪从善的弱点。在参观石景山钢铁厂时，和群众一起开座谈会，他发言认罪时说：“我叫徐远举，就是《红岩》小说里的徐鹏飞。我的罪恶是极大的……”“徐鹏飞来了！”这消息顷刻间传出，远近许多群众都到停车场要看看这个魔鬼的真面目。后来在南京雨花台参观，徐远举又旧调重弹，终被领导批评：“你这样发言，假如在场群众站起来向你讨还丈夫、父兄或是儿子的血债，你怎么办？”

真是各有千秋：曾任过四川省主席王赞绪的儿子、四十一军军长王泽俊，每一开会发言的公式是三骂一哭：一骂国民党，二骂共产党，三骂自己，最后嚎啕大哭，哭到后来他自己

也莫名其妙！

几个战犯的变化

在功德林，方靖见到的几个国民党军队中的赫赫有名人物，变化都很大。

第一个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他是“国军”中二十九员上将(包括蒋介石)之一，在战犯中军衔最高。其资历在国民党军中也是绝无仅有：毕业于保定军校速成班(比保定一期还早)，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便当了上尉连长，带一连人进驻西藏，后来回到内地只剩下几个人。他与蒋介石同龄，很受蒋器重。当初四川军阀如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都争当省主席，蒋介石左右为难，最后选定王陵基这个老资格，使几个军阀自愧不如，无话可讲。

四川即将解放之时，蒋介石派一架飞机去成都把王陵基的六姨太接到台湾，名曰“免王主席后顾之忧”，实际是当作人质以坚王陵基效忠至死的决心。这大概也是王陵基在成都和平解放之时，不肯参加起义而私自化装逃跑的原因。

王陵基化装潜逃至宜宾地区的江安县，为群众认出：“你不是王灵官吗？”于是被捕。“灵官”是四川民间故事中的“阴曹地府”索命厉鬼，王陵基有此“美名”，足见人民群众对其何等痛恨。

这个人一生享足了福，因此几乎生活不能自理。兼之官僚习气很重，老气横秋，动不动就摆老资格：“你们这些娃儿懂个什么！”后来他的神志逐渐不清了。

其次的老资格要算范汉杰了。他在粤军中已当到少将旅长，又进黄埔军校第一期。所以毕业出来便升了师长。方靖与

范汉杰是江西第四次“围剿”之后在庐山训练团相识的。训练团也是连、排编制，范汉杰任连长，方靖任排长，所以两情甚好。方靖还记得当年的范汉杰颇为精明强干。但是，在功德林所见到的范汉杰，却已老态龙钟，平日嘻嘻哈哈，爱和人打诨，很少说正经话。

变化得令人吃惊的是曾经烜赫一时的特务头子康泽。他是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头子，在江西“围剿”时专门组织别动队搞特务活动。后来又是三青团的总干事。抗战期间，康泽活跃于四川各大学，是个口若悬河的人。有一段时期，凡“国军”中嫡系将领遇有疑难之事，会习惯地讲这么一句话：“不要紧，去找照明（康泽的字）就解决了。”足见其在军政界很是“玩得转”。

方靖在功德林见到康泽时，他已经因为患病而语言不清，结结巴巴的，很难与之对话。后来他获得监外就医，“文化大革命”期间“二进宫”后，病故在狱中。

在秦城 劳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功德林在押战犯转移至北京郊区秦城。这里正在兴建一座设备完善的监狱，战犯们来到时，大楼主体工程尚未竣工。

大楼的后面，有一座荒山，监狱的负责人带领着战犯们劳动，决心把它改造成花果山。秦城至小汤山新修的一条十五华里的公路，两旁要植树，也由管理人员带领战犯们去种植。

监狱的负责人考虑到，这些劳动对战犯们来讲是比较重的，所以再三强调：不限时，不限量，各尽所能。并对一些长期病

号予以照顾。

尽管领导上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关怀照顾战犯，但是在战犯之中，却有个别人不能善意理解。杜聿明是长期病号，已经割去一个肾，平时一般劳动都给以照顾，如此重劳动就更需要照顾了。所以领导上便分配他负责测量距离，检查挖坑的质量。这工作虽然轻，却需要走来走去活动。有的人就不能谅解，认为自己满头大汗地干重活，他却人在人前摇摇晃晃，便说些讥讽的话。一位“兵团司令”就说过：“哼，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实干家，不需要工程师！”这时的“徐州前敌总指挥”已经十分有涵养了，做到了充耳不闻。真果是：“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

还有一种人，虽然力不胜任，却不愿向共产党“乞怜”。方靖就属于这一种人。

植树分三人一组，要求挖一米二宽，一米五深的坑。由于土质欠佳，还需要从山下抬好土回填；栽上苹果树苗后，又要从山下抬水来浇灌。

方靖和某兵团司令卢锦泉、七十二军军长杨文泉三人为一组。这个组的主要劳动力是杨文泉，因为方靖和卢锦泉都是体弱多病者。

方靖患有两种疾病：一是小肠疝气，一是痔疮和脱肛。这两种病是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得的，因为军务繁忙，也因为初得病还不甚严重，所以只采取消极治疗办法：小肠疝气用了疝气带，痔疮和脱肛严重时，便在坐椅上垫一个充气的橡皮圈。这些年病情虽然在不断加重，他却始终隐瞒不肯说。他认为：“我在国民党当将军时得的病，不能在当了共产党俘虏以后哀求治

疗。”他不愿要求在劳动中照顾，也是与他不愿申请治病的理由相同。

杨文泉虽然有一身蛮力气，但是挖坑不得法。他们挖了两天才完成一个坑，还不合规格，别的小组已开始挖第三个坑了。军人的性格是不甘落后的，虽然说“不限时，不限量”，但差得这么远，脸上无光。方靖急得团团转，就脱去外衣，跳下坑去用手刨石头。这一下，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注意，李振江处长跑过来帮助他们，才发现方靖腰间缠着好几条带子，便跌脚埋怨说：“嗨！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有这样的病，怎么能劳动呢？快上来吧！”

方靖被强拉上坑，心犹未甘，说：“我能干！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李处长摇头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我们并没有要求一致嘛。不是早对你们说过不限量，不限时，病号要照顾吗？”

方靖眼见李处长挥镐干起来，再也忍不住了，急忙背转身去，偷偷抹去两行热泪。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还是在一年前的事：有一次功德林大搞卫生，方靖被劳动组长分配去擦玻璃。当他登上窗台时，被管理员发现，急忙叫他下来，并且批评负责分配劳动的小组长罗历戎：“你分配劳动应该考虑到每个人的年龄大小，身体状况。他这么大年纪，身体又很单薄，让他登高擦玻璃，摔下来怎么办？”

那一次他虽然也很感动，但又认为是管理员想得周到，怕他摔下来惹出麻烦。这一次不同了，共产党的处长不仅关心了他，而且替他去干！他现在能体会到杜聿明为什么要说“共产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了。

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呢？战犯们当然不能仅凭学习到的文件为准，还要看得到，体会得到，才能真正理解，衷心信服。他们能看到和体会到的，除参观访问以及会见家属、民主人士外，还有便是生活待遇以及接触到的管理人员。他们甚至把管理人员对他们的言行，看成了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的化身。因此，方靖把管理员和李处长对他的关怀照顾，都看成了共产党对他们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宽大政策的具体体现。后来李处长看到方靖因为干了几天重活，病情加剧，便坚决不再让他参加劳动。

在卧病几天中，方靖想得很多。

一九四五年底，方靖在重庆陆军大学甲级特别将官班第三期受训，结业后同青年军二〇三师参谋长赵秀昆乘吉普车去泸县，在璧山县附近翻了车，摔成重伤，由一辆过路的空军卡车把方靖送回重庆，住进中央医院治疗。过了几天，陈诚派方天到中央医院看望方靖。方天见他坐在病床上，谈话对答适当，才说了实话：“辞公派我来看望你，因为听人说你伤得很重，怕不能理事了，就打算要刘英汉去接你的军长职务。现在看来，你的伤还不碍事。我回去向辞公报告，不必派刘英汉去了。”很显然，陈诚以为方靖不能再为他效命，就准备把他一脚踢开。

相比之下，谁好谁坏，不是十分清楚吗？

方靖毕竟是明是非、有感情的人，怎么能够顽固到底，拒绝改造呢？

一九六四年陈诚在台湾病故后，监狱的领导找方靖谈话，问

方靖同样在幻想特赦后的生活情况：他的儿子在北京，当时已有了一个孙儿和三个孙女，都在每月两次接见家属时见到了。他的女儿在上海，从通信中也已得知有了外孙和外孙女。因此他设想特赦后定居北京，每年到上海女儿家中住一两个月，这样的晚年是够幸福的了。他还曾想过：在国民党军队里戎马半生，虽然晋级为将多年，却从来不敢设想自己最后的结果，因为那时年年月月甚至天天都在打仗，而且是处于尔虞我诈的环境里，谁也不能断定自己会有个善终，现在能有此理想的晚年幸福，是共产党给的，自己应该不忘共产党的恩德，不忘自己是有罪的，要继续自我改造，争取多做贡献。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功德林在押战犯集中在礼堂，主席台上悬挂红绸横幅：“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

方靖看到这一横幅，欢跳的心骤然受到压抑。他分析“首批”二字的含意是否定“全部”。稍可安慰的是那个“批”字，含意是“众多”而不是单一。他希望自己虽然不能占“首”字，却能包括在“批”字之中。由于他在反复推敲这两个字，竟没有注意到主席台上大会主持人的讲话。直到主席台上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特赦名单，坐在他身边的宋希濂表现出焦躁不安的举动，才把他惊醒。

原来人民法院代表宣读的名单是：第一名杜聿明，第二名曾扩情。宋希濂听到没有自己，便坐不住了，连连掏出手帕来拭汗。其实是多余的焦急，第三名便是宋希濂。接下去是：王耀武、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杨伯涛，周振强、卢锦泉等十名。其余都是关押在外地各监狱的。

宣读完名单，特赦人员领了特赦证被送走，其余的战犯回去讨论。

战犯们发牢骚了：

“我也流汗水，写材料……哪件事不如他们！为什么我就不该特赦？”

“大的都放了，我们这些小的要等到哪天才放呢？”

“一次才放十个人，这么多人要到那一年才能释放完呢？”

有人说怪话了：

“这次特赦根本不是按改造表现好坏释放的，而是按地位、代表性释放的。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名人物；曾扩情是黄埔一期第一个授衔中将的；陈长捷是傅作义的人；郑庭笈是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的侄子；卢锦泉是龙云的人；周振强跟孙中山先生当过卫士，又是蒋介石侍从室出来的人；杨伯涛代表“国军王牌”十八军；邱行湘跟陈诚当过副官，陈诚在台湾当政，自然要释放他！”

陈诚系统的人也不服气：“杨伯涛才上任当了十六天的军长，就把一个王牌军送掉了，他怎么能够代表十八军呢？”

十个人的“缺点”几乎都被一一指出。有一个曾经当过总统战地视察官的，甚至歇斯底里大发作。

监狱领导没有批驳这些牢骚怪话，稍后便布置战犯们开展找差距的讨论。这样一来，牢骚怪话自然平息。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在秦城礼堂召开第二批特赦大会，释放了以李仙洲为首的十一名战犯，牢骚怪话就少了。因为在第二批特赦人员中，包括了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使战犯认识到：无论罪恶大小，

只要确实改恶从善，都有光明前途。这对战犯们以后的改造，起了良好的作用。

再去秦城

一九六〇年春节后，战犯们又回到秦城。此时秦城监狱的主体大楼已经竣工。

功德林虽然被称为“模范监狱”，条件还比较差，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火炉。秦城不仅有暖气设备，卫生设备也齐全，战犯们四、五个人住一间房，厕所、盥洗间就在卧室旁边。郊区的空气比城区新鲜，地域宽敞，环境清静，战犯们每天早上起床后，可以在花园里打太极拳；早饭后，到外面去作些田间劳动；中午午睡；下午政治学习。每周可以看一次电影。除内部澡堂外，有时管理人员还带他们去小汤山洗温泉浴。

在秦城分配给战犯们的劳动，有养鸡、养猪、养兔、种菜、种花草、照管果树等等。原在功德林组织起来的理发、缝纫、修鞋等小组，也仍然保留。

方靖的劳动任务是种花草和修鞋。他对葡萄的剪枝技术很有讲究，至今他的住房前种的一棵葡萄树，都由他自己管理、剪枝。一九八三年葡萄“丰收”，刚好文强去拜访他，他叫小孙女剪下一串让文强尝新，文强赞不绝口，半开玩笑地说：“不经过改造，你这个中将军长大概还不知道葡萄是怎么长的哩，不能不说是接受改造的成绩吧！”

一九六一年一月，方靖被送进北京复兴医院，动手术治疗小肠疝气；一九六三年冬，又二次住院割治痔疮。这两种在国民党当将军时得的病，终于在当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后，得到了彻底的治疗。因此，不管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三批特赦、

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四批特赦、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五批特赦，他都榜上无名，但是情绪一直比较稳定。

前三批特赦的办法都是背靠背的，直到宣布时，战犯们才知道谁获特赦；第四批是预先将特赦人与其他战犯分离开，所以大家早就心中有数；第五批特赦前先在内部宣布特赦人名单，让大家讨论是否合适。后两批特赦人员相对来讲是少一些，所以引起了一些议论。

第五批特赦以后，便组织在押战犯去江浙一带参观访问，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访问，时间也最长。在参观期间，还允许战犯会见在各地的家属，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战犯们议论，大参观后必然会有大特赦，于是情绪沸腾起来。回到秦城，监狱领导及时给战犯们降温：特赦仍要根据各人的认罪程度、改造表现，分期分批进行，决不搞一风吹！

方靖对下一批特赦比较有信心，因为在第五批特赦以后，他作了自我检查，挖出了隐藏在思想深处的东西。

原来方靖的原配夫人早故，一九四六年他在宜宾续弦，新娘是当地县立女子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年仅二十二岁，这时方靖已年过半百。婚姻是由媒人介绍，女方完全自愿，但其基础可想而知。方靖被俘以后，对这位年轻的夫人来讲，意味着她追求的财、势落了空。一九五三年方靖在刘家花园改造时期，女方提出离婚，经法院征得方靖本人同意，判决了离婚。对于在女方寄存的财产，法院通过军人监狱向方靖询问，方靖交代存有黄金几百两，然而隐瞒了一部分。他当时这样做，倒不在于想替女方多保存一点钱财，而是想到，一旦能够出狱，可以

去向女方讨还一部分，以作远走高飞之资，企图东山再起。

经过十年改造，方靖终于认识到当时的企图是极反动的，于是向领导作了彻底的坦白交代。

第六批 特赦

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第六批特赦消息传到秦城，方靖、孔庆桂、牟中珩、杨光钰、李佩青等五人，时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找他们谈话，时而接受记者采访，时而又被领导叫去量身材尺寸，准备给他们做送行的新装。

战犯们又开始讨论这五名预定特赦人员是否合格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摆了出来。例如有人说方靖有一次把半个馒头扔在地上，“充分说明他不爱惜粮食，不尊重农民的劳动果实”，上纲上线联系到过去，结论是：“这种人怎么能够特赦呢？”其实这件事在当时方靖就曾再三检讨，却过不了关。管理员作了调查：方靖本来食量较小，午饭只能吃三两至四两，那天中午开饭时，他要了两个二两馒头，因上午没有劳动，只吃了一个半，剩半个吃不下，便放在口袋里，准备下午劳动时再吃。下午劳动掏手帕擦汗，却忘了这半个馒头，顺着手帕掉在地上。他当时也一惊，想拣起来拍掉尘土再吃，但已被人发觉，便很难分辩了；更使他着急的是管理员把半个馒头拿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生活会上检讨过不了关时，却是管理员来替他解了围：“这件事应该提醒方靖注意，要珍惜粮食。你们现在也参加田间劳动，应该体会到粒粒皆辛苦嘛。但是，也不能说方靖是在有意浪费粮食。再说，我把那半个馒头拿去喂猪了，也没有糟塌。我建议这个问题就讨论到此为止吧。”

监狱管理人员把战犯们对预定特赦人员提的意见，都作了分析，把大家说服了。许多人说：“好了，好了，你们五个快走吧！你们走了，我们也好安心继续学习改造！”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jh.com